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

中国出版史论

刘兰肖 主编

雅外借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

中国出版史论

刘兰肖 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史论 / 刘兰肖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3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 / 魏玉山主编)
ISBN 978-7-5068-4705-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
研究—中国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7716号

中国出版史论

刘兰肖 主编

责任编辑	卢安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93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705-6
定 价	49.00元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魏玉山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平 王 勤 王 飏 冯建辉 刘兰肖
刘拥军 李广宇 张 立 张凤杰 吴永贵
吴培华 宋慧献 陈 丹 陈丽菲 范 军
庞沁文 罗紫初 赵 冰 聂震宁 黄先蓉
黄晓新 魏玉山

分册主编

《数字出版学导论》	主编：张 立	副主编：李广宇
《出版法规与著作权法论析》	主编：张凤杰	
《现代实用编辑学》	主编：吴培华	朱坤泉
《中国出版史论》	主编：刘兰肖	
《现代出版学概论》	主编：庞沁文	

《中国出版史论》

编撰人员

主 编：刘兰肖

编写人员：刘兰肖 卞卓舟 刘 峰 叶 建

总序

出版学研究要为出版改革发展服务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一套五本)即将出版了,作为这一套丛书的负责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套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研究课题2005年立项,历时8年于2013年4月通过专家评审,顺利结项。但是与课题研究配套的教材编写却颇费周折,在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的资助下,教材以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也算是对整个课题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交代了。

出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不仅比文学、史学、经济学等年轻,就是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比也很年轻。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形成的时间比较短,从1931年我国著名文献学家杨家骆在《图书年鉴》中提出出版学的概念至今不足百年,而我国的出版学研究真正起步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出版学命名的图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的。在国外,出版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起步时间也不早。1963年韩国学者安春根出版了《出版概论》,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出版,1967年,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在《读书人》杂志发表了《建立出版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972年出版了《现代出版学》一书,开始把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构建。由于这一学科起步比较晚,所以其研究成果不足,教育界、学术界对其认识也不足,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出版无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特有的概念、原理和范畴,有独特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构成。它虽然与传播学、



管理学、文化学、图书馆学等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不同于其他各学科。出版学之所以出现比较晚，是因为出版业作为独立的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被大家关注较晚。

出版学是应用之学、实践之学、行业之学。出版学与文史哲等学科不一样，它是一门广泛运用于出版实践又紧随出版实践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应用科学。最近 30 多年来，中国出版业乃至世界出版业，都出现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新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金融资本的渗透越来越加剧，一方面呼唤出版理论支撑并为出版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素材，一方面现有的理论又不能回答现实的许多关切；一方面需要有大批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投身出版业，另一方面原有的教学体系包括教材又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为了总结出版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总结出版理论创新的成果，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出版改革与发展，我主持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目标是在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以出版实践的理论升华为核心，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学科内涵、概念、范畴和体系，对出版学科的课程体系予以明确，并编写部分核心课程的教材。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出版学应当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中划分出来，成为与新闻学、传播学并列的同一级学科。

随着出版学研究不断深入，出版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在许多高等学校设立，公开发表的出版学研究论文不可胜数，公开出版的出版学论著也颇为可观，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正在逐渐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所设的 12 个学科门类、88 个一级学科、382 个二级学科中，出版学并不在其中；1998 年教育部修订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编辑出版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之下的二级学科；2010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下达 2010 年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通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院校成为出版专业硕士授权点；2011 年教育部将出版正式列

入《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由此可见，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正在由不明确逐渐走向明确（当然，时至今日，出版学依然没能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十分明晰，各高校出版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比较随意，没有达到相对的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版人才的培养与出版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作为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写核心教材是我们的任务。经过多次的研讨，我们认为出版学、编辑学、数字出版学、出版法规、出版史等有关方面的知识，是出版教育的核心知识，为此我们组织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及有关院校的中青年学者、教师共同承担这些核心教材的编写任务，由于这几本书带有探索性质，与正式教材不同，我们称之为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我们力求做到具有集成性、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形象性，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最新的出版科研水平，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及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其结果与初衷定会有不小的差距，不妥之处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将来修订再版时加以改正。

现代出版学研究丛书于2014年2月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可见国家出版基金办及评审专家对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是高度重视的，借本套丛书出版之机，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向所有支持、关心、参与本套丛书编写、审稿、出版的同志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魏玉山

2015年4月16日

绪言

什么是出版？这是学习研究出版史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出版”是指“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另据1971年修订的《世界版权公约》，“出版”是指“可供阅读或视觉可以感知的著作以有形的形式复制并向公众普遍发行的行为”。对以上定义加以概括，“出版”一般包括四个要素：一是记录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思想、信息的作品；二是对作品进行编辑加工；三是运用各类复制技术；四是通过一定传播渠道向公众传播。也就是说，“出版”是将知识、思想或其他信息产品经过加工和复制，通过一定途径向公众传播的活动^①。

一

世界出版业始于何时，国外尚无定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出版”条的叙述为：“出版是对书写的著作物的选择、复制和发行。尽管它在现代已变得依赖于印刷和纸张，但它的产生比这两者都要早。”也即是说：世界出版业的开端早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G. 昂温，P. S. 昂温（英）著、陈生铮译《外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更加明确地指出，“出

^① 肖东发：《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6页。



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如今，众所周知，出版依赖于三大发明，即文字、纸张和印刷术，以及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普及。”基于上述认识，该书将公元前 3000 年埃及最古老的书——纸莎草纸卷作为世界出版史的起点。

国内学界有关出版起源的分歧，主要涉及对出版活动的认识。有人认为有了图书就有出版，有人认为有出版物就有出版，有人认为有发行才有出版，还有人认为有印刷才有出版。可见，对于中国出版史的起源，史学界、出版界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大体有如下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观点之一：有了印刷术才有了出版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刘国钧为代表。他认为，“有了印刷术，然后图书才可以说得上‘出版’，才开始有出版业”^①。《新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条解释为：“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报主要靠人工书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才开始有出版事业。”

观点之二：雕版印刷发明前有抄本出版时期，抄本出版萌芽的时代以纸的发明和改进为标志。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刘光裕为代表。刘光裕在《出版文化史论·序言》（华文出版社，2002 年）中提出：“作为出版物的书籍，仅仅指采用出版技术制作的那一部分书籍……古代的书籍不一定是出版物，古代的出版物不限于书籍……出版史是出版物制作与流通的历史，也是出版事业、出版制度、出版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出版史必须将出版物与书籍区别开来……中国是出版技术的发源地……从蔡伦于公元 105 年发明蔡侯纸算起……有纸以后，抄本立刻出现了”。此外，《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概况》（《中国出版年鉴》创刊号，1980 年）从西汉时期发明原始纸张开始叙述图书在中国出版的历史。

观点之三：发行事业的开端，即出版事业的开端。西汉时期书肆的出现，就是中国出版业的开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林穗芳为代表。他认为：“考

^①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第 64 页。



察出版事业的开端不能把着眼点局限于图书产生的物质技术条件，同时还要看制作出版来的图书是否向公众发行……没有发行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行事业的开端，也就是出版事业的开端。据史籍记载，我国在西汉末期出现了书肆……不仅是我国发行事业的开端，也可以看作是 我国出版事业的开端。”^①

观点之四：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字的产生，是编辑出版的萌芽时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肖东发、王振铎等为代表。肖东发认为，《逸周书》中的“铭之金版”、《黄帝内经素问》中的“著之玉版”，《墨子》中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都可称为是早期的出版活动……可以说，“出版”一词在中国虽然仅使用了不足百年，但出版活动、出版工作和出版事业的逐步形成过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②王振铎《从甲骨版片看编辑与出版的起源》（《中国编辑研究》2002年卷）认为：“我国的编辑出版活动，就是萌芽于用文字来记载、刻板和传播精神文化的殷商时代。”此外有代表性的论述还有：黄镇伟认为，中国唐代就已出现“版行”、“刊行”或“梓行”，“付梓”，“镂板”，“刻版”，“雕版”等词，都与雕版印本书籍的生产相关，是唐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图书生产后出现的术语。但是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出版活动就始于唐代。在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前，中国的图书传播经历过一个漫长而辉煌的传抄时代，正是因为传抄的相对低效难以满足日趋旺盛的社会需求，所以寻求生产制作技术的创新才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传抄时代的起始，当不晚于殷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的双重证据，中国历史上的编辑出版活动应肇始于殷商时代。^③姚福申也认为：“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我国最早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是甲骨、玉版和钟鼎……那时人们将文字资料记录下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是想保存历史档案，供后世子孙缅怀祖先的业绩……这些工作由史官们一代代继续下去，那就是

① 林穗芳：《中外编辑出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3页。

② 肖东发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辽海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③ 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中国编辑史上最原始的阶段……据出土的实物资料推断，这一阶段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①有关中国出版史的教材及专著对于出版史起点的叙述，如张召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等有关编辑出版史的教材或专著，均从文字的产生说起，也可看作是对第四种观点的赞同者。

以上关于出版起源问题的分歧，源自不同的标准。主张以雕版印刷术为出版起源的学者，其标准是成熟的复制技术；主张以抄本为出版起源的学者，其标准是出版物；主张以书肆为出版起源的学者，其标准是发行与传播；主张以殷商甲骨为出版起源的学者，其标准是文字产生。针对上述问题，叶再生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他提出，图书发展有六个决定因素：创造出文字、文字的载体、书写的工具、文字的保存、文字的复制、图书的流通。这六个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只有全面解决好这六个问题，人类文明才能发展。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就是在解决这六个问题中一步步摸索，一步步前进的。从这一认识出发，叶再生将图书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以开创文字的时期为第一期。^②从总体上来看，这或许是对中国出版起源较具历史眼光的论述。

二

出版的起源，既有技术的支撑，也有观念的推动。关于出版观念的产生，一般认为始于人类自觉进行的历史记录。殷商时期，人们对于重大活动均用占卜方式作出决策，并把占卜的事项、结果或应验，用文字符号记录在龟甲和兽骨上。这种被称为甲骨文的文字，是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依据。西周时期，人们选择在青铜器上面铸或刻写文字，以之记载重大事件，被后世称为钟鼎文。这些铭辞的结尾常常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字句，也即

^① 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② 叶再生：《编辑出版学概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41页。



希望承垂后世。从这个意义说，青铜铭文比甲骨文前进了一步，被赋予了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载的性质。而这种历史意识，或许就是出版观念的源头。

历史意识是出版活动得以产生的深刻动机。人们把某一文本或记录通过一定的载体或复制形式进行传播，其深层的观念依据，是试图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把人的活动和思想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即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与我们今天的传播观念迥然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纵向传播和代际传播的深度传播观念。《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墨子》的《尚贤》《明鬼》等篇更加明确地说：“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于竹帛”，“咸恐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大夫叔孙豹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一“三不朽”的价值观，尤其为后世推崇和遵循。特别是对于“立言”的重视，引导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文以载道”。他们把文字和文字传播看得尤其重要，即便不能在当代彰显，也要传诸后世、以待知音。司马迁在《史太史公自序》中谈及自己写《史记》的动机就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刘知几写《史通》，因担心此著不能流传“泪尽而继之以血”。明代学者何乔远写的分类体明史著述，书名就叫《名山藏》。历代文士更是热衷于把自己的文字结集刊刻。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统计，仅宋代就有739人的诗、词、文别集（或合集）流传至今。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去世前作《白氏集后记》中说：“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用五本分藏的方法让自己的作品最终得以保存，古人为文字传世而费尽心机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古代出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刻、坊刻、家刻、书院刻书、寺院刻书等五大刻书系统中，以家刻系统的文化属性更为突出，也是因为那些成就卓越的私

人藏书和刻书家参与刻书事业的目的，考虑更多的是传承文化，而不是市场需求。他们刊刻之书，多是经史子集及有用于世的实学之作，而非迎合大众的通俗作品。在这一出版传统的背后，其深层的观念依据，就是长期以来起主导作用的代际传播和纵向传播观念。

总体来说，自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出版传播的观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世致用。讲究经世致用，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提出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等观念，特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哲学，引导古代知识分子沿着由内而外的路线，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在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作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经世致用的观念在出版实践中不断丰富起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书籍具有彰往察来、垂法万载的功效，通过整理汇编《六经》，保存了许多有助于治理国家的历史文献，并且通过确立一系列编辑原则以别善恶、寓褒贬，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不仅深刻揭示了《春秋》的政治功能，也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书籍编纂和文献整理之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西汉时期，司马迁自觉将经世致用作为《史记》的编辑宗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①在他看来，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考察历史重在“稽其成败兴衰之理”，把握古今盛衰的规律，寻求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此后，经世致用思想在出版活动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刘知几关于“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②的论述，深刻揭示了编纂史书的社会价值及其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二是杜佑提出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鲜明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高度自觉。三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在前人

① 司马迁：《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44页。

②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华书局1980年，第206页。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经世致用的实现路径,就是要“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①及至清代,王夫之发展了司马光的这一思想,强调史书必须信而有征,“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实”。^②由此可见,作为我国古代出版观念之核心的经世致用,其思想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体现在出版实践中,一是在通经致用思想推动下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经注书籍,二是在以史为鉴思想指导下推出了一批历史和史学著作,三是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编写刊刻了一批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的类书。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还持续兴起了“经世文编”和“经世文续编”潮,也就是将各种经国济世之文,主要包括治国思想策略以及典章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编纂形式汇集起来的出版热潮,被称为清末民初“六大世风”之一。

二是辨章学术。在历史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的古代图书出版活动,直接推动了传统学术体系的建构。从西汉以至清代逐步形成的图书典籍四部分类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内核。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也就是说,典籍是儒家进行王道教化的教材,学术的目的在于维护王道伦理的秩序,所有知识的界定及其展开都要以此为准绳。由此形成的以经为根,依经、史、子、集之次第排列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体系,构成了以经典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③古代学者在整理图书的出版活动中建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也逐步形成了以目录学和校勘学为特色的古代出版学术思想。孔子整理“六经”即以“仁”为中心,他还总结出“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编辑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先秦以来藏书的过程中,提出了“校讎”的概念。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校讎通义》曾作出全面的总结:“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中华书局2013年。

③ 左玉河:《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这里的“部次条别”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对刘向、刘歆出版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刘氏父子“参以司马迁之法”，作《别录》《七略》，后者用《辑略》作序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用《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略》作为分类编目，这就属于部次。在此基础上再分为“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10家，按流别对图书进行分类。此后，把刘氏思想发扬光大的第一人，是宋代的郑樵。他在《通志·校讎略》中全面阐述了图书目录“通古今之变迁，明学术之源流”的思想，并在《通志·艺文略》中提出了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方法，被称为创建图书目录学的先驱。郑樵认为，目录学的任务就是条理书中的学术，告诉人们如何治学，书的存佚是学术盛衰之表征，只有“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才能使人们“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①。这就从学术的角度辨明了整理图书与制作官私藏书目录之间的不同。及至清代，在考据学盛行的学术环境下，章学诚撰写《校讎通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歆和郑樵的思想，提出三个方面的主张：一是全面总结目录学的传统，指出目录学应以探讨学术源流、考究其得失为宗旨；二是顺应学术发展大势，提出以类例申明学术，对四部分类法进行调整：“《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三是推广互著与别裁之法。“互著”、“别裁”是分类著录中的两个重要辅助方法，其前者是将同一书分别著录于甲乙两个类目，后者是把书中某一部分从本书析出，著录于其他类目。这两种方法，一为求“全”，一为求“备”，根本目的都在于使四部之法既能辨章学术，又能方便稽检。对此，章学诚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的学术成就，从理论上对互著别裁之法进行了系统论述，推动古代出版学术思想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爱国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时

^① 郑樵：《通志·校讎略》，中华书局1987年，第831页。



代背景下，西方近代出版观念传入中国，通过有识之士的传播而深入人心，推动出版业呈现出不同于古代的近代特质。近代中国起支配作用观念形态，是以反抗列强侵略为主旨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观念的形态在出版实践的表现，一是推动了翻译出版，二是开启了教育出版。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据学者统计，从1840年到1861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②创建于1868年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71年正式出书至辛亥革命前期，翻译出版西学著作达200多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维新派更是高标“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的出版观，大力宣扬译书对于变法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③戊戌政变后，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增多，掀起一波新的翻译出版潮。仅商务印书馆1902到1910年间出版的译作就达330种，其中严复的《群己权界论》《天演论》等译作，大力传播各种西方近代思想，切实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近代“出版第一人”的张元济，怀抱教育救国梦想，成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力编译教科书，“筚路蓝缕，煞费苦心，得成一种辅助教育的新事业”^④。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也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的出版观，认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⑤。陆费逵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教育出版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华书局创立之初编写出版一批新式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共同开启了近代教育出版的先河。

四是出版自由。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古代出版思想在近代的发展，那么伴随着近代中文报刊这一新式出版物而输入的出版自由思

① 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四）》，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

②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72页。

③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④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4页。

⑤ “广告”，《中华教育界》1912年第2期。